

一部推銷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圖書館學辭典

陳霖生

在黨領導全國人民大躍進的時候，圖書館也同其他戰綫一樣，在為廣大人民提高文化方面、為經濟建設方面、為科學研究方面創造了很多奇蹟。圖書館員本身也迫切需要武裝自己成為一個又紅又專、紅透專深的人民文化戰士。因此，對一部圖書館學辭典的出現是抱着萬分興奮的心情來歡迎的。可是盧先生這部“巨著”却使人大失所望！總括說來，這部“辭典”充滿着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氣氛，極端缺乏無產階級學術觀點的新生血液。它有形無形地企圖在圖書館界繼續抱着已被拋棄的資產階級學術旗幟不放。因而它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更談不到指導我們圖書館工作的實踐。現在對這部“辭典”提出以下幾點問題和看法：

一、不言而喻，任何辭典所收容的東西都應該是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詞彙和內容。然而這部“辭典”的詞彙和內容却正相反。

(1) 介紹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詞條（見“中國圖書館事業”130頁）一共只有兩頁。材料是從“圖

書館工作”1957年8、9期上抄下來的。為時已隔一年，我國的圖書館情況是否就止於此呢？當然不是的。特別在黨號召全民大躍進後，黨在辦圖書館的方針上提出了如何走羣眾路綫，提倡兩條腿走路，提出“民辦圖書館”的口號，去年六月“圖書館工作”上就刊登了這方面的論述，後來十月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民辦圖書館、人人夸贊——圖書送上門，讀者開腦筋——”的文章。胡耀輝同志特別還寫了“大力發展民辦圖書館”的文章。這是我國當前圖書館事業的方向。這些文章雖然有的發表較遲，但是如“民辦圖書館”、“送書上門”、“專業書目”、“羣眾書目”等為羣眾服務方面的詞彙都是早就有的。可是在這部“辭典”上都只字不見。相反的，資本主義國家腐朽的東西則湊上了不少，也不加以正確的解釋。如：“免費公共圖書館”解釋為“經費系由政府撥款維持，當地人民有免費借書權利的圖書館”（見288頁），原文系抄自1930年圖書館學季刊。如果只從這個解釋看來，好像除了這類圖書

有直接的責任。

一個校閱者，對待出版物應當採取怎樣態度呢？革命的導師列寧認為，認真校對是出版著作的必要條件之一。他在1898年12月4日給叶利札羅娃的信中談到出版“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時，寫道：“在出版條件中，最重要的是保證十分認真的校對，否則，就完全不值得出版。”（“列寧家書集”，見“書籍、雜誌和報紙的校對工作”瓦羅夫著，1956年，時代出版社）。這樣就清楚地說明了校閱者的重大責任。而劉國鈞先生在校後記中推薦這部著作時還說：“對於不懂得圖書館學術語的人，在閱讀圖書館學書籍時檢查參考，確有很大便利”。但接着又說：“查閱本書的人，如不細心，易生迷惑，加以書中資料來源不一，遂致內容不免有互相抵觸之處”。劉先生的這種前言不對後語的說法，充分地說明了他的不負責任的惡劣作風。另一方面，劉先生却強調編者和校者都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借以推脫編校者的責任。這又是一種多么惡劣的手法啊！

(四) 出版者和校訂者的 不負責任態度

一種書刊的出版，出版社應該絕對對讀者負責，這是社會主義文化教育原則所要求的。而商務印書館到現在還出版這麼一部質量低劣的“辭典”，這說明它對讀者是不夠負責的。

出版工作是上層建築的重要部分，它必須為經濟基礎服務，從而才能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是衡量出版物的唯一標誌。離開這一點，就無從評價書籍出版的意義。

我們的出版工作，應該符合客觀的需要，應該具有高度的現實意義。否則就是違反社會主義的出版原則，也就是違反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這是全國人民所不能允許的。

另外，對於參加校閱者來說，一個出版物的質量，除了編著人以外，校閱者是最後的負責人。不論在理論觀點、文字內容的各个方面，校閱者都負

館，我們的圖書館看書就要征費似的。這是什麼樣的解釋？這又是什麼樣的态度呢？真正使人莫明其妙。

(2) 對待新、舊分類表沒有絲毫分別。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圖書館工作者曾經付出辛勤的勞動，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原則，與圖書館具體情況相結合，並學習了蘇聯先進的經驗，前後編制出了幾種新型的分類表，其中如“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表”是用集體力量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類型的分類表之一。但在这部“辭典”中，却只用一頁半的篇幅簡單地輕率地抄錄了原表“說明”中的一小部分（原表1—5頁）。而對該表的类目，根本就沒有介紹。是否沒有介紹的必要呢？再看，對蘇聯圖書十進分類法改訂本（安巴祖勉等編）（見262頁）也只簡單地介紹16个类目。相反的，對於那些資本主義的產物，則詳加介紹，大肆宣揚。如“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見110頁）、“中國圖書十進分類法”、“杜威十進分類法”等等，却都用了較長的篇幅，詳細介紹了細目。而對“杜威十進分類法”竟介紹到第五位號碼，凡140余类目。不难看出，在編者的心目中，對待新、舊分類表是大有厚薄之分的。

(3) 在敘述“中文圖書分類法沿革”條（見102頁）時，僅由漢劉向父子起，至杜威十進分類法被介紹到我國為止。這個沿革的最後寫道：“在方法上可分為幾派，（1）增補杜威派，如查修；（2）仿杜威派，如皮高品、沈祖棻、杜定友；（3）改革派，如洪有丰、裴開明、劉國鈞。其中以皮高品、杜定友、劉國鈞三家較為流行。”（見109頁）。這倒是一口道破不管補、仿、改杜威，都沒離開杜威分類法的真相。然而，所謂“中文圖書分類法的沿革”是否到此就是登峯造極了呢？不是的。它不過是分類法發展的一個過程，那是充滿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过程，應該加以批判。而盧先生却對解放以來圖書館工作者以辛勤勞動所編制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分類法，略而不詳，視若無睹。試問編者是立足于哪個立場的？

對於西洋圖書分類法沿革的介紹（見223—231頁），雖然比較詳細，但是沒有提到蘇聯圖書分類法在分類法史上所起到的革命作用；更沒有想到另辟蘇聯圖書分類法沿革一條來加以介紹。而這份材料又不加批判地抄襲1934年文華圖書館專刊的

材料。難道從1934年到1958年這25年間西洋分類法就沒有任何變化么？那末為什麼編者却看不見呢？是否帶上了有色眼鏡，認為那些陳舊的東西就是天經地義的真理？可想而知，編者的心目中只是有過去，而沒有現在的。

在一些理論論證上也很難以令人取信。例如：“杜威十進法……大類順序基於唯心主義的世界觀，將自然科學列於社會科學之後……”等等（見109頁）。是否自然科學放在社會科學之後就是唯心主義世界觀呢？我國中小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就是社會科學在前，自然科學在後的。難道也是唯心主義的嗎？另在“分類、分類法”詞條（見141頁）的理論中，也是生搬硬抄，並沒有提到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對於知識分類的理論。可見編者對這一知識分類的理論是不感興趣的。

二、這本“辭典”中所介紹的圖書館技術、方法等辭彙，也都脫離了現實，落後於實際。編者似乎置身世外，沒有看到我國圖書館工作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前推進。很多新事物在發生着變化着，而這部“辭典”則並未加以反映。還是販賣資本主義國家圖書館的老一套。例如：在當前圖書館界所注意的“固定排架”問題，雖然生抄了“圖書館藏書的組織”上的一段（見309頁），但是沒有和我國圖書館所發生的情況相結合。同時“連續固定排架”這一詞彙也沒有列入。此外，圖書館界的許多新事物，曾在圖書館刊物上刊登過，但都未得到反映。如：分編指標、工作定額、新書如何縮短時間與讀者見面等等。這部“辭典”所介紹的，仍然是那些支離破碎的老辦法。如：“圖書館工作程序表”（見840—842頁），從購置圖書到編目完就，須經68个工序，而對那些圖書館員所辛勤創造的能夠達到多、快、好、省的辦法，如節省工序、改進技術等絲毫沒有得到反映。這樣，對圖書館工作能起到什麼作用呢？同樣，在工具改革上也沒有介紹幾年來的新發展和新成就，如曾在圖書館刊物上介紹過的印片機、多用油印盤、自流墨刷、調墨法等等，在这部“辭典”中只字不見。而所看到的是：1933年馬宗榮的“現代圖書館經營論”中的“雜誌夾、雜誌架、目錄箱”等等幾乎都是被拋棄不用的東西。

三、在名詞的蒐集和解釋上，也不是從當前的實際需要出發的。“辭典”中所有的名詞實際上很少回答日常工作中所要解決的問題。相反的，却把一

些可有可无、不一定属于图书馆学范畴的东西拉来凑数。我们工作中希望解决的问题，如“提存书、封存书及其标准”、“新善本”、“读者分析”等等这些词彙，在这部“辞典”上只字难寻。然而，不甚相干的常識性的词彙，如“签名”、“签字”、“课本”、“教科書”等，則堆砌不少。有些词彙只要稍加介紹指出出处就可以的，也把它整套抄来，以扩篇幅。如“标点符号用法”（見 421—431 頁）約占一万四千字；“翻譯”（見 687—690 頁）也抄了四千多字。此外还有不少不必要的互見，如“类分、分类方法見分类、分类法”（411 頁）等等。除了浪費紙張而外，还給讀者增加了麻煩。另有一些不中不外的名詞也蒐集得不少。如“件名目录”見主題目录（見 250 頁）等等。編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們認為，編者的这种做法不仅是由于对图书馆学的无知，而且是在故意擴張篇幅。

四，这部“辞典”在編排上也有考虑的必要。例如，本文是字順排列，索引也用字順，就显得重复。莫如做一分类索引，或本文按类排列而索引則用字

順排列。这样本文与索引才能起到两种作用。現在这样的排列只不过是本文的一个縮形而已。

五、校訂者对这部“辞典”是不够負責的。在校后記中提到这部書的某些概念带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內容。既然知道有着这样严重的缺点，就該帮助編者加以改正。但校訂者不但不帮助編者改正缺点，反而甘心充当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維護者，尽量加以吹虛，这是很不应该的。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推銷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图书馆学“辞典”。它不是我們图书馆工作者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它既不能指导我們的实践，也不能对我們理論研究有所帮助。相反的，却給图书馆界带来不少的毒害。我希望編者和校者不要含糊糊塗，表面上与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学术的应声虫。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对于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予以严厉的批評，同时尽量反映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名詞并加以正确的解釋，这样才能符合当前图书馆界的需要。

应该徹底檢查批判和重新審改这一重要的工具書

王 昂

卢冀京先生編的“图书馆学辞典”，在1958年9月由商务印書館出版了。精裝一厚冊，拥有九百頁的篇幅，搜集的資料也很广泛。但是，只要翻閱一下这本书的內容，就会感觉到它并不像是一本新的图书馆学辞典，而是拼集罗列起来宣傳资产阶级观点的图书馆学資料彙編。在这大跃进的时代，一切事业都在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拔白旗、插紅旗，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向前發展着。我們在图书馆学的領域內，也必須首先要政治掛帅，批判一切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因此，对于这样一本东拼西凑、粗制濫造的書，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見：

1. 名詞解釋缺乏正确的立場观点。譬如对“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一詞的說明，只詳細罗列了許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图书馆名称及其藏書数量，对于它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一点，却只字未提。又譬如詞典中有“閒書”一詞，編者解釋为是为了消閒而看的書籍。这种解釋也是極不正确的。人們通过閱讀書籍会得到不同的知識，或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不能把書籍解釋为一种是可以起作用的，一种

是供賞玩消閒用的。

2. 分不清一般名詞与图书馆学名詞的界限。为了扩充篇幅，将不属于图书馆学的名詞也收进去了。例如，“遺失”、“論文”、“课本”、“新聞”、“評論”等，都是一般名詞，收了进去，就使辞典的篇幅过分龐大，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3. 有的名詞解釋过于冗長。实际上是为了扩充篇幅，而不加選擇、客觀主义地抄繕資料。使人看了莫之所从，不能解決問題。譬如“集中編目制”这一名詞的解釋，把魏生同志关于目前各館編目卡片的情况及意見完全抄录下来，以此来代替对于“集中編目制”这一名詞的解釋，是不恰当的，也是不能說明問題的。

总之，通过上述几点情况，可以看出“图书馆学辞典”的編者是極不严肃負責的。特别是他有意扩大“辞典”篇幅，多方抄录，对于資料內容不加選擇，不負責任，突出表现出资产阶级营私牟利的作风。个人認為，应该徹底地檢查、批判和重新審改这一重要的工具書，以符合于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願望与要求！